

当代思想家访谈录 ● 包亚明主编

当代思想家访谈录

# Jürgen Habermas

哈 贝 马 斯 访 谈 录

现代性的

地平线



6.59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安东 段怀清译 严 锋校

哈 贝 马 斯 访 谈 录

Jürgen  
Habermas

现代性的  
地平线

李  
安  
东

段  
怀  
清  
译

严

锋  
校

责任编辑 唐继无  
封面装帧 王建纲  
制 作 裴小沁

当代思想家访谈录

包亚明 主编

**现代性的地平线**

——哈贝马斯访谈录

李安东 段怀清 译

严 锋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56,000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2513-4/B·233

定 价 12.50 元

## 编者前言

将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这五位当代思想大师收录在一套丛书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强制的文本间性,这对于阅读与理解来说,究竟是一种便利抑或是一种伤害,始终是困扰我的编选工作的一个疑问。聊以自慰的是,作为同一代知识分子,这五位思想大师毕竟都分享了共同的社会与思想资源。布尔迪厄在《学术人》的英文版前言中曾分析过他们这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他认为福柯、德里达等人,也包括他自己,都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奇异的位置,正是这个位置使得那些原本非做不可的俗事变成了出于知识分子良知才不得不为的事。在正常情况下,他们这一代人原本将注定要在学术体制内凭借他们学术上的成功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而学术上的成功无疑会把他们领到体制内的统治地位。然而,他们这一代人却偏偏经历了学校的体制就在他们脚下崩溃的体验,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他们看到并经历了这一传统的统治地位的塌陷,因而都被引向了反体制的道路,这一反叛的根源存在于他们与作为一种体制的大学的关系之中。这一反叛的姿态通常是被作为一个自由降临的、自由决定的选择来体验的,

甚至被作为多少有点“英雄气概”的决裂来体验的。但布尔迪厄却认为这一反叛姿态其实是被社会历史决定的，正是他们所处的奇异位置，使得这一代人的集体命运变成了一个可以作出选择的选择性。

哈贝马斯也从这场社会动荡中看到了体制的非自然的、人工的特征，因而合法性问题引起了这五位思想家的共同关注。而在现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使批判成为可能，则成了他们都必须回答的共同问题。哈贝马斯与四位法国思想家的分歧与冲突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也许有必要着重分析一下哈贝马斯与福柯的交锋。

福柯在引进权力的同时分析了知识以及非推论性(nondiscursive)实践的各种形式的系统，他宣称权力事实上既生产知识又生产实践。哈贝马斯在承认权力的同时，坚持认为权力应当由一个能够在合法使用权力与非法使用权力之间作出规范性区分的批判理论来调合。为了作出这样的区分，哈贝马斯引进了交往行为理论。在这个理论中，话语的理想化的前提通过“话语的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得到了认同和证明。福柯向这一先决前提的存在提出了挑战，而哈贝马斯则试图赋予这些前提以普遍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人在处理批判与权力的哲学话语时采取的立场根本不同，福柯将权力与批判联结起来，认为权力本身就是推论性的，而批判只是与权力相关的众多推论实践中的一种。哈贝马斯则认为这样一来权力无疑会削弱理性的基础和批判的实践效用，因此，他认为哲学话语应该分离批判与权力，而批判的作用是使权力搁置起来，然后来证明在伦理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中被从实用主义角度预先假定的普遍规范是否合理。这无疑承认了话语和权力都是自主性的领域，

而这正是福柯要否定的东西。福柯认为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影响(power-free)的话语,也不可能用这样一种话语来推行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由启蒙运动开创的批判的普遍性应得到保存,而福柯则认为必须保存的是对启蒙运动这个事件及其意义的提问,因而他把批判性思考界定为对被认为是普遍的和必要的东西的提问:“我的目标之一是向人们表明,许多他们认为是普遍的、是他们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些非常确切的历史性变革的结果。我所有的分析都是为了反对关于人类存在着普遍的、必要性的想法。”也就是说,普遍性,像主观性和理性一样,必须从界定启蒙运动的特性,即历史性这一角度来理解;事实上,对福柯而言,普遍性的历史性就是主观性和理性的历史性的后果。在这个语境中批判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被指称的普遍性的调查,这牵涉到把它们与历史性的其他形式联系起来的问题。例如,当福柯批判人文主义时,他的观点并不是要拒斥它的所有原则,而是向人文主义对普遍性的要求提出挑战,即把它的自我理解当作一种非历史性现象来揭露:“关于人文主义我所担心的是它作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向任何种类的自由展现了我们伦理学的某种形式。我认为在我们的将来存在着比我们能在人文主义中所想象的更多的秘密、更多的可能的自由和更多的创造性。”因此,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认为当福柯在一组推论的实践和权力的关系中追溯人文主义的历史起源时,福柯的目的是要理解人文主义的现时形式是如何成为今天这种样子的,这反过来又使我们能够探讨未来的选择形式。福柯的这些方法同哈贝马斯重新追溯现代性哲学话语道路的起点的方法极其

相似。这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历史性论辩和批判。

那么，福柯为什么又总是向普遍性挑战呢？根据德鲁兹的看法，理由是因为普遍性也是历史性的，因而不能解释任何东西，事实上它们本身就需要解释。他认为在社会体制中，普遍性（例如自由）没有其他的意义，无非是使对一种不断变化的估计成为可能，它们表明了一种历史性过程。福柯关于普遍性所要具体地拒斥的仅仅只是传统地赋予它们的那种非历史性，而他则承认以德鲁兹方式解释为历史中的变量的普遍性，这意味着他挑战的是普遍性的必要性，而不是普遍性本身。福柯把普遍性理解为变量，并不意味着他像哈贝马斯所驳斥的那样因此就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某种形式，即认为知识和理性的所有形式都是等同的，因为它们同等地从属于权力关系。

对于普遍性的坚持与拒斥，的确是哈贝马斯与法国思想家发生冲突的焦点，德里达对普遍性与确定性的颠覆是最激进的，虽然哈贝马斯与德里达都共享了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成果，但理论取向却大相径庭。哈贝马斯抨击利奥塔背弃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积极的方面，从而陷于非理性主义，这一指责也完全适用于德里达。利奥塔则认为，这样的抨击带有一种将理性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特点，在他看来不存在单一的理性，只存在多种多样的理性。不存在一个巨大而唯一的理性，这只是一种空想，相反，却存在着多元的理性，至少存在着各自独立的理论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和美学的理性，这些理性是由完全不同的成分构成的。忽视这一点恰恰是19世纪以来德国思想中理性唯心主义的显著特征，他们假定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样的，这种理性同一论和理性绝对论正好是一对，都是错误而危险的。

布尔迪厄也反对哈贝马斯式的普遍性规范,他主张以一种坚定的历史决定论的方式探讨规范问题和理性问题,他从不关注“普遍性的兴趣”存在与否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谁对普遍性感兴趣?对某些行动者来说,如果对普遍性感兴趣,必须达到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他关注的是某些场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在其中行动者为了满足他们独特的兴趣,而尽力创造了某种普遍性?这些场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为什么在其中行动者感到必须以普遍性的保卫者自居?布尔迪厄只承认在某些场,在某一时刻存在着对普遍性感兴趣的行动者。同时,他也认为理性是历史性的产物,理性的条件是被历史性地决定的。存在着理性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可以降格为它的历史,而是意味着使真理的产生成为可能的那种交流的社会形式的出现,存在着历史条件。

我着重强调哈贝马斯与法国思想家之间的冲突,并不意味着忽视法国思想家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四位法国思想家思路各异,也时有交锋,比如利奥塔在批评德里达时,援引他批评康德的话:“批判美学在使形而上学衰退的同时,开放了通向本体论的道路。”他认为德里达有陷于“不在场”的本体论的危险。利奥塔认为“不在场”的概念本身是由德里达本人所构造的,德里达认为任何存在都可能是不在场的,因而不在场比存在本身具有更强的适用性。但利奥塔认为“不在场”这一概念有流于简单之嫌,因为至少存在的不在场是在场的,存在本身是在不在场中显现的,如果它是不在场的,那么它也就是在场的。其实,德里达与利奥塔之间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对差异概念的界定上,德里达把差异运用于所有风格、所有话语和所有联系上,并通过对所有的事物作出区别来显示所有联系和话语的差异。德里达因此



而遭受了陷于怀疑论的指责,利奥塔认为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怀疑论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同义词,但他又强调可以很好地证明这种指责的合理性。在利奥塔看来,差异概念主要是建立在时间概念上的,而后者则来自《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演绎,并为海德格尔所发展。毫无疑问,这个时间概念是一切图式的图式,也就是给定的所有内在综合的形式。这种给定的内在综合形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详细地阐述过,这种形式从属于某种真假攸关的语言游戏。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第二个《批判》中的时间性问题,也就是伦理学的时间性,马上就会碰到另一类困难,因为它们涉及的是义务的时间。但在第三个《批判》中,对那些适用于审美感受力和趣味的综合所作出的细致考察,明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里的时间性也是与第一个《批判》完全不同的,这并不是自我与其本身的不同,与其说第一个《批判》所考察的时间综合似乎是悬而未决的,还不如把它归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审美判断中,这种综合可以既不是认识的,也不是再现的。鉴赏本身是在一种最初始和最低限度的方式中被理解的,所以,人们便被引导去构想一种审美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完全不属于差异的等级,它遵从的不是第一个《批判》所涉及的东西,而是一种似乎悬置或阻断的时间状态,这种状态简言之就是差异本身的一种“中断”。

利奥塔认为在审美时间中重要的东西是可以被称为“在场”的东西,“在场”并不是指“目前”,也不是指“什么存在”,而是说在“在场”中,对进入形式的给定的材料所做的初始综合活动是悬置的,在“强烈”的审美瞬间,很可能思想与材料是处在一种非间接的关系中的,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综合活动。德里达显然不会同意这种有形而上学之嫌的论

述,但利奥塔则认为德里达过分迷恋于维护思想活动的统一性,因而“开放了通向本体论的道路”,而布尔迪厄在《区分》中则从另一角度探讨了康德的审美判断与学术场之间的关系。

尽管四位法国思想家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尽管哈贝马斯与他们的冲突那样显眼,但正如迈克尔·凯利所说,这五位思想大师仍然具有根本性的一致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拒斥康德的批判范式,这一批判范式是建立在先验的、自我建构的(理论的和实践的)主体这样的概念基础上的,这一概念在胡塞尔等现象学家手中得到了延续,又被萨特等马克思主义者以历史哲学的形式接收过来。但是,拒斥这一批判范式恰恰是在20世纪后期区分哲学家的一大标志。这五位思想大师都同意,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必须分别证明其真理性和公正性,因为它们不可能再依靠宗教、形而上学或任何其他传统的、规范性的基础。因而批判是这些科学的哲学组成部分,它将提供这样的证明,同时批判又必须证明自身的准则,譬如,伦理学如何能合法地运用一个非普遍性原则来决定哪些伦理准则是有效的,而却又不去证明那条非普遍性原则呢?换句话说,这一困境是由于知识与批判在丧失了外在的参照性后,只能自我参照才形成的。凯利认为正是这个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的批判何以可能的问题,使当代哲学家陷入了一个潜在的陷阱,他们在共同抛弃了康德的批判范式后,并没有认同另一个取而代之的批判范式,这无疑削弱了有关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基础,因为正是这种仍未被认同的批判范式,支撑了当代哲学中的身份意识与批判性的反思。其实,在知识只能自我参照的情况下,如何开展批判,是一个摆在所有人文科学工作者面前的

艰巨而又难以回避的问题。

本丛书的策划、编选、翻译总共只用了半年时间，由于时间的仓促，再加上编者、译者的学识所限，错误不当之处肯定不少，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客居美国期间，曾与明尼苏达大学的刘擎先生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作了广泛的交流，没有这些交流也不会有编选这套丛书的想法；柏克莱加州大学的邹羽先生为本丛书提供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张迅博士，在编者启程回国后，代为邮寄了大量编者无法随身携带的资料，而且在本丛书的编译过程中，对编者所急需的资料，总是有求必应，不辞辛劳，在此致以特别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唐继无先生，他在本丛书的策划、编译以及后期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精力，没有唐继无先生大量艰辛、细心和耐心的工作，这套丛书不可能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包亚明**

1996年12月2日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包亚明·主编

# 当代思想家访谈录

# 目 录

编者前言	包亚明(1)
战后世界的思想与社会	(1)
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	(24)
理性辩证法	(41)
生活方式、道德和哲学家的任务	(82)
德国学生运动的角色	(109)
关于道德、法律、公民的不服从和现代性	(119)
现代性的地平线正在移动	(126)
新历史主义的局限	(133)
一种哲学——政治的侧面描述	(141)
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大学	(177)
后形而上学思维中的主题	(192)
作为文学的哲学与科学	(199)
译后记	(218)

## 战后世界的思想与社会<sup>①</sup>

**佛洛登塞尔** 我想以一个特殊的问题开始我们的话题，即“三十年”以后。说到这三十年，其中自然会想起以色列国的成立。请问，这段岁月对你意味着什么？早在1948年时，你曾经抱有什么希望？三十年后，哪些实现了，哪些则落空了？

**哈贝马斯** 如果真有什么希望实现的话，那也决非是我学生时代所希望的。在经历了短短几年政权真空期后，货币改革宣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新建立和社会秩序的恢复，这一劲势远远超出了我当初在战争结束时的预料。事实上，我和朋友们当时的希望抹上了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那时我们正处在纳粹的肆虐下，处境令人心惊。《纽伦堡审判》及稍后的一些列纪录片都充分展示了当时的境况。我们相信精神与道德的更新是必须和必然的，此外没有第二条路。结果不到三十年就应验了。我记得是1949年，当时持民族保守主义立场的德意志党正在召开一次竞选该党主席的大会，会场上到处悬挂着黑白红三色旗。当他们高唱《德

---

<sup>①</sup> 哈贝马斯与佛洛登塞尔的访谈，选自哈贝马斯《小政论集》I—IV，法兰克福，1981年。——译注

意志四海为家》<sup>①</sup>第一节时，我立刻跑了出来。几个月后，那个当选为主席的赫·西博姆成了阿登纳领导的联邦政府的一名部长。总之，我当初的希望显得虚幻缥缈，今天我难以再述及它们。

**佛洛登塞尔** 容许我提一个私人性的问题。在你还是十五六岁时，展现给你的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你是如何度过五年来的战争岁月的？你又是如何在希特勒统治下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它对你今后智力的成长有什么影响？上述这些是否有一个总体意义？

**哈贝马斯** 1945年秋我回到学校时，所在城市并未遭到剧烈的破坏。我们的经历已在那些“碎片文学”，像安德切（Andersch），理查德（Richter），和后来波尔（Boll）等人的少量散文以及反法西斯回忆录中得到反映。现在能忆起的还有恩斯特·高更（Ernst Kogon）的《SS州》，冈特·威森鲍（Gunter Weisenborn）的《纪念碑》，萨特的《苍蝇》和《在密室》。物质的严重匮乏（首先是饥饿与寒冷）；经济急剧下降到最低点；充满地方色彩的管理当局；文职人员和军人双重管理下的行政机构；在主要机构和组织解散后，小团体及其基本联系日益突出——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道地平线，界定了我们非社会学的世界观。我们的问题首先是道德的和生存的。奇怪的是我们拿来使用的主要人类学概念竟与社会和经济重建问题南辕北辙。不久就显而易见，重建工作最终不得不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来进行。我个人的看法，所发生的这一切的背景是战争社会主义的情绪和“第三条路”计划，这是一条在所有不同政党之间开辟的路。

---

<sup>①</sup> 自1945年以来，这首歌只有第三节得到官方认可。——译注

现代化运动的逐步恢复主要吸引了青年人,这场运动在法国遭到过禁止。首先要说的是一次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哈伯里齐·科莱克辛(Haubrich Collectton)大开了我们对表现主义绘画的眼界,我们通读了从特拉科(Trakl)到本恩(Benn)的表现主义诗歌,通过介绍我们还了解了机能主义与包豪斯,萨特的长篇小说和O·F·博尔诺(O. F. Bollnow)的存在主义叙述使我们回想起卡夫卡和里尔克。当代文化舞台已被托马曼的《浮士德博士》和黑塞的《玻璃珠游戏》等长篇小说所控制。电影《第三者》则展示了整整一代人的经历。

今天回顾所来径,我不无惊讶地认识到,尽管当时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可它们的观点却烙上了强烈的德意志色彩,带着狭隘的地方观念,当时我仍在波恩求学,直到1954年我才感到自己一直处在大学环境中;沉浸于艺术和社会科学,这种20年代的传统被毫无异议地直接恢复了,30和40年代也未中断过。目前大家一致公认,在哲学人类学方面要读普莱斯纳(Plessner)和吉尔伦(Gehlen),在现象学方面则应该学习尤根·菲克(Eugen Fink),卢德维克·兰德革雷(Ludwig Landgrebe)和奥斯卡·贝克(Oskar Becker)等人的著作。我们还运用路维斯(Lowith)移居时所写的著作。但我们却从不被教导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弗洛伊德、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我在学校时已读过了由东柏林出版,古默斯堡共产党书店发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小册子。当时除了劳沃特杂志<sup>①</sup>外,

---

① 德国占领后,劳沃特先是以报纸式的大开本出版书籍,后来才开始出版平装本。——译注



要读到这些确实很不容易。我是在学生时代偶然接触到了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到了50年代则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雷内·科尼克(Renekonig)回到科隆,普莱斯纳回到哥廷根,弗朗西斯(Francis)回到慕尼黑,霍克海默(Horkheimer)回到法兰克福,社会学才被当作一门学科重新建立。社会学的思想也开始为公众所接受。得感谢布洛赫(Bloch)和阿多诺(Adorno),是他们的著作让我们茅塞顿开,懂得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其传统远远超过了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影响,更适宜于进行系统的研究。精神分析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当时我已在研究心理学,并听说了“精神分析学”。可是直到1956年我才有机会聆听弗洛伊德的演讲,这次演讲是由马科斯·霍克海默和亚历山大·米切尔里奇(Alexander Mitscherlich)邀请并组织的。我当时感觉到弗洛伊德创立了一门科学理论,一个有着重大深远影响的精神分析学派,他的态度是严肃的。最后,我们通过卡尔纳普(Carnap),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n)和波普(Popper),熟悉了盎格鲁-撒克逊地区的主要哲学流派。我们感到他们的科学理论和语言学分析有一套极为严格的标准,这时欧洲大陆哲学已无法再让人满意了。在文学、音乐和美术领域中,以及在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中,激进的先锋派蔚然成风,这一不争的事实证明了现代主义已被真正接受了——如果我的记忆尚正确的话,这大约是50年代后半期的事。作为现代主义主要阐释者,阿多诺,以及由他引介的本亚明(Benjamin)扮演了重要角色。

你问到希特勒主义对我智力发展的影响和可能产生的总体意义。是的,所有传记资料都关乎人的特殊性。总的来说,我们可能一时难以克服纳粹给我们智力上和文化上造